

“译情”：从关联翻译理论看文学翻译的情感移植

李成明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要:关联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个动态的推理交际与认知过程。情感与风格是文学作品的精髓所在,文学翻译的焦点与根本是情感移植,风格翻译则是文学翻译的化境。作为动态的艺术审美与艺术创造的过程,文学翻译是译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译文重构原文的形象美、音乐美、意境美,形似与神似并举,完美地再现原作的意境、风格和神韵。

关键词:关联翻译理论;文学翻译;情感移植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2)04-0063-05

纵观近40年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不难发现,研究已经从最初的静态文本转换走向了与其他领域相结合的道路。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及文学研究的发展成果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使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促进了文学翻译的繁荣。“情感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焦点,文学翻译“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译‘情’,或者叫做‘情感移植’,离开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文学翻译”。^{[1]273}

一、关联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与以往的翻译理论不同,关联翻译理论^①不仅强调译者的重要性,而且还注重译文读者的重要性,原著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交际流程。根据关联翻译理论,翻译首先是一个推理交际过程。译者必须考虑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与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并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推理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确定最佳译文,确保翻译这一交际过程的成功实现。同时,翻译还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且还涉及除语言能力之外的诸多因素,包括源语文本的选择、理解、阐释,文本的重建和文本的后续生命,以及译者与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教育程度、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欲使交际成功,关键的问题便是听者如何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可以利用的全部假设里设法选出切合实际的、言者试图传达的那些假设。”^{[2]26}而这些假设就是“认知环境”,是交际双方共同享有的一个语境,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认知语言学认为,语境是具有认知性的,信息的传递不能仅仅依靠语境,因为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要求人与外界的互动,即认知体验。在译者理解原文并构建译文时,原文作者和译者虽被置于相同的语境,但是由于二者的外部生存环境与认知环境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译者并不能得到与原文作者完全相同的理解。因此,译者应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背景扩大认知语境,最大程度地了解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并据此对作者

收稿日期:2012-06-20

作者简介:李成明(1965-),男,山东泰安人,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①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虽属语用学的范畴,但对翻译学富有极强的解释力,对翻译实践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该理论由丹·斯珀伯(Dan Sperber)与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于1986年在《关联:交际与认知》(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其学生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 August Gutt)据此对翻译进行了研究,并于1991年出版了《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一书,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关联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有效地解释了翻译这一复杂的语言现象,彻底解决了多年困扰翻译界的诸多问题。

的交际意图作出合理的推论,以达到与原文作者的成功交际。同时,译者还应该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进行合理的推测,利用原文的背景知识及其他相关信息帮助读者适当扩大认知语境,以确保译文的可接受性,充分地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

关联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类交际关键在于创造一种对于最近关联性的企望,即听者企望他试图进行的解释能以最低的加工成本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2]30}即最佳关联性,这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译者的责任所在,即“努力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企盼(expectation)相吻合”。^[3]

杨武能先生认为:“与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著和译本,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的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的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1]227-228}功能目的论创始人之一、德国学者诺德也认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源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由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通过翻译得以顺利进行。^{[4]28}

钱钟书先生曾明言:“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5]78}这个“历程”就是译者同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进行交流的一系列思维认知活动,这个过程不是靠单纯的语言解码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语言编码所产生的“语义体现”进行推理,“使之充实才能用来代表任何有意义的东西。”^{[2]131}

从原作语言中体会作者的意图,需要译者对原作信息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与推理,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译一篇文学作品,如一首诗,无非是把原作者的本意、思想、感情、意境如实地传达给读者,使读者的感受与作者当初写作时的感受一样或差不多。但作者当时的感受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无法去问作者。这只能从字面上去推测。……而他所达到的理解程度,就不一定完全与原作的本意相吻合了”。^{[6]29-30}

诺德认为,专业翻译工作者与文学批评家或语言学家一样,他们阅读要翻译的文本不是以简单直观的方式,而是用批评和综合分析的方式。^{[4]12}从形式上来说,翻译的过程是将源语转变成为目的语的过程,实质上却是用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与情感风格。由于两种语言遣词造句规律不同,情感表达方式不同,译者必须在语言上调整变通,以实现原作的表达效果,这就是文学翻译的“再创作”。译者要将原作看作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灵活运用系统的结构性、相关性、有序性等,对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与推理,依赖语境寻求等值表达信息的最佳方法,从而实现语言的再创作。所以,叶君健先生指出,“精品”是指一部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能成为该文字所属国的文学的组成部分,丰富该国的文学宝藏。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就不单是一个“移植”问题了,它是再创造,是文学的再创造。^{[1]120-121}

文学翻译不是词句的形式对应,而是语言信息与美感因素的整体吸收与再造。原作品是由完整的或一系列相对完整的意象块组成的,译文只有再造完整意象或意象块,才能有效地实现艺术的再创造。^[7]由于语言本身带有较强的模糊性与含蓄性,语言形式的转换、文学形象的替换、新术语的创立,无一不需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创造性。译者必须在最大限度地保持与原文信息一致的前提下,展现原作的意境,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的交际语境。

钱钟书先生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概括为“化境”,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5]77}高健先生曾以诗性语言再现了马克·罗斯福(Mark Rutherford)原作的神韵,将一幅美丽宁静的水上风景画面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Some fishing boats were becalmed just in front of us. Their shadows slept, or almost slept, upon

the water, a gentle quivering along showing that it was not complete sleep, or if sleep, that it was sleep with dreams.

眼前不远,渔舟三五,凝滞不前,橈影斜映在水上,仿佛睡去,偶尔微见颤动,似又未尝熟睡,恍若惊梦。^{[8]27}

译语读者能够清晰地领悟并强烈地感受到原作语言的艺术效果,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真可谓“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

文学翻译既不是单纯从一种有形结构——原文到另一种有形结构——译文的静态转换,也不是由译者任意发挥和创造的纯主体作用过程,它是译者与文本作者相互作用的结果。^[9]译者必须从原作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中理解并接受其所蕴含的情感因素,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审美能力,用另一种语言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并保持原作艺术形象的完整与和谐。这样一个双向的建构过程不仅受到源语和目的语两种不同语言结构的影响,更会受到语言结构之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译者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教育程度、跨文化交际能力等。

二、文学翻译的情感移植

“情感”与“风格”是所有文学作品的精髓所在,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列夫·托尔斯泰指出,“艺术感染力的深浅程度决定于下列三个条件:(1)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2)传达这种感情的清晰程度如何;(3)艺术家真诚的程度如何,即是说,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那种感情的力量如何。”^[10]文学翻译若忽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而只传达其认知内容,“会违背文学的属性”,^{[1]81}毕竟情感移植才是文学翻译的根本。从翻译过程看,对于原文的选择,翻译动机的触发、动力的形成,乃至原文意象再现的完成,无不伴随着情感。从翻译活动的心理能力看,译者的感知力、想象力都离不开情感。^[11]

情感色彩作为文学作品美学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因性的模糊集合。^{[12]14}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实践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模糊推断及模糊概念。这种带有强烈主观性的模糊推断及模糊概念难免影响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诠释,进而错误地传递作者的情感,误导读者,使翻译这一交际活动不能流畅有效地进行。衡量文学翻译的标准首先是看对原作在感情而不是在字面上忠实与否,能不能把字里行间的(例如语气)译出来。倘若把滑稽的作品译得一本正经,毫不可笑,或把催人泪下的原作译得完全没有悲感,则无论字面上多么忠实,一个零件不丢,也算不得忠实。^[13]萧乾先生的这番话明确地把文学翻译活动中的“情感翻译”即“情感移植”放在了首位。作为译者,必须提高认知能力,充分体验原作语言结构所包含的情感信息,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重构,以最恰当的译语语言形式和最佳关联性,全方位地展示原作的艺术美感体验,传达作者的情感世界。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于文学翻译中情感色彩的传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译者只有在译前对原作者的审美情感及浓聚于源文本(特别是浓聚于其人、事、物、景中)的审美情感准确把握后以适当的心境才能和谐地移情;译者须内心活跃;译者只有在活跃的审美心理状态下才能主动移情;译者须具有良好的美学修养;译者只有具备良好的审美能力储备在审美心理活跃的状态下才能充分移情。”^[14]

文学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艺术审美与艺术创造的过程。文学文本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包含有语言信息以外的美感因素。译者在阅读和理解源文本过程中,有语言认知与美感体验双重活动,并在大脑中形成一个格式塔意象,以译文语言将此意象再造,方可实现文学艺术的有效转换与再现。真正的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与接受原文时,首先建构一个认知图式——具有格式塔质的整体意象,然后再用译文语言再造这一格式塔意象。^{[8]27}

朱自清的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描写月下的荷塘: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叶子中

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由远及近、由上而下,从茂密的荷叶到多姿的荷花,以动写静,以虚写实,动静结合,情景交融,营造出一种朦胧、幽美的意境。尤其是大量使用叠词如“曲曲折折”“田田”“亭亭”“层层”“缕缕”,以及迭声词“袅娜”“仿佛”“渺茫”等,使该文不仅具有了形象美,更具有了音乐美、意境美,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朱纯深和杨宪益先生的译文都抓住了原文中的意象和意境,构建了一个立体式的视觉图像,并试图通过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即语言转换)再现原作的情感和神韵,在用词上都注重再现原文意境的静态美。

Here and there, layers of leaves are dotted with white lotus blossoms, some in demure bloom, others in shy bud, like scattering pearls, or twinkling stars, or beauties just out of the bath. A breeze sirs, sending over breaths of fragrance, like faint singing drifting from a distant building. (朱纯深译)

And starring these tiers of leaves were white lotus flowers, alluringly open or bashfully in bud, like glimmering pearls, stars in an azure sky, or beauties fresh from the bath. The breeze carried past gusts of fragrance, like the strains of a song faintly heard from a far-off tower. (杨宪益译)

相比之下,朱纯深先生的译文用词力求准确恰当、句式结构力求均衡工整,并对原文所描绘的艺术形象进行了意象再造,如头韵“here and there”“layers of leaves”等、并行结构“some in... others in...”“like scattering pearls, or twinkling stars”等。从整体效果上来讲,其译文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读来朗朗上口,不仅达意鲜明,而且生动地传达了原文的形象美、音乐美和意境美,巧妙地再现了原文的意境和神韵,因此更胜杨先生的译文一筹。

不同的译者由于具有不同层次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就会产生不同的移情感受,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诠释,形成各不相同的艺术形象,既相似,又不尽相同。^[15]

正如党争胜所言:“文学翻译既要求内容之真,又要求形式之美。这就要求译者在^[16]不违背译入语语言使用规范的基础上,对蕴含在原文表达方式、篇章结构和交际意图之中的审美要素尽量予以保留。在此过程中,译语的准确性、生动性、表现力以及和谐美是保证译文语言审美效果的关键因素。”^[16]著名翻译家蒂里特(Tyrwhitt)一语中的:“翻译贵在发幽掘微,穷其毫末。在造句与琢句方面,要译出其文;在性格方面与风格方面,要译出其人;在褒贬与爱憎方面,要译出其情;在神调与语感方面要译出其声。”^{[12]273}

文学翻译除了要注重“情感移植”外,还要着重强调“风格特色”。风格翻译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文学翻译的“化境”,准确无误地传达和再现原作风格的译文是翻译的上乘之作。因此,风格翻译所采用的语言应该是最能体现原作风格的语言,是传神的语言、艺术的语言。与一般“达意”的语言相比,这种语言具有形象、生动、鲜明、准确、凝练、富有感情色彩等特点。^{[1]333}风格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不仅要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还应具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表现力,以便将原作的思想情感与艺术魅力在译作中传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原文信息的“等值”转换,而是译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是译者洞悉原文作者的笔调、意境和思想感情的过程,从而使读者能够从译文中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世界。

翻译是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情感交流的过程,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切翻译实践中最具艺术价值的活动,涉及到文学、语言学、符号学、逻辑学、文体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17]在文学翻译这一美学交流行为中,译者需要正确解读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寻求译作与原作之间的最佳关联,恰如其分地运用文学语言,在译文中重构原文的形象美、音乐美、意境美,“形似”“神似”并举,使原作的艺术形象在译文中准确、鲜明、生动地得以重生,完美地再现原作的意境、风格和神韵,让读者充分感受到原作的情感世界和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许钧. 翻译思考录[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 [2]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 London: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 [3]林克难. 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 中国翻译,1994(4):7.
- [4]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 Amsterdam:Rodopi,1991.
- [5]钱钟书. 七缀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6]叶君健. 读书与欣赏[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 [7]姜秋霞,权晓辉. 文学翻译过程与格式塔意象模式[J]. 中国翻译,2000(1):27.
- [8]王大伟,孙艳. 高级翻译评析[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 [9]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
- [10]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M]. 戴启篁,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24.
- [11]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98.
- [12]李海军,范武邱. 文学翻译中情感色彩的传递:译者主体性视角[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6).
- [13]萧乾. 文学翻译琐议[J]. 读书,1994(7):88.
- [14]隋荣谊,李锋平. 从审美移情出发固推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8):57.
- [15]潘卫民,钱妮娜.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移情作用刍议[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2):52.
- [16]党争胜. 从翻译美学看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三个原则[J]. 外语教学,2010(5):98.
- [17]茅盾. 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M]//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11.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and Emotional Input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 Chengm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input is vital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which should be both expressive and emotional. According to Gutt's relevance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ve inference for original language explanation,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serving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arget text reader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eaders as to whether they can experience both alien cultures and the aesthetic value in the original work.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refore, the translator should reproduce the original aesthetic image and style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author'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so as to convey the original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charm to target text readers.

Key words: relevance theory;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reason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emotional input; aesthetic value

(责任编辑:江 雯)